

中国现代史丛刊

(第二册)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二冊)

吳相湘主編

1963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臺初版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二冊

基本定價三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吳相湘

發行人 蔣建白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海外總經理 集成圖書公司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4296)

內政部登記證 內警臺業字第一〇四號

前言

中國現代史叢刊的出版計劃：每一年度不定期印行兩冊。第一冊已於今春三月行世，這是第二冊。就中國出版界說來：專門以研究現代史爲中心的書刊，過去尙不多見。惟其如此，本叢刊一切草創，需要隨時的改進。即如這一冊的體例和第一冊即略有不同：主要的是資料部份的篇幅增加了，并且力求與有關論文能相配合。

由於國人厚古薄今的習慣：搜求佚文典冊不惜間關涉水到山崖石穴去訪尋，最近數十年來影印古版書籍的風氣尤盛極一時；而於現代史資料則漫不加意任其毀棄，復因政治關係，公私立圖書館於現代史料也多不購藏插架著錄，更談不到編印有關現代史的書目了；以致當前搜尋現代史料的困難不下於購求唐卷宋刻。若干研究者因沒有書目可循，更有無法控制資料之苦。因此，爲便利同好，尤其是引導青年朋友的興趣，在選載專題研究論文之餘，輯錄稀見史料，并分別專題編印史料書目，顯然是本叢刊應該多加致力的。

歷史資料的搜集，有賴於隨時隨地的留心，甚至片紙隻字也不要輕易放過，這樣才可以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羅家倫博士手撰「一個幾乎被失落的歷史證件」，就是標示一最佳的範例，同時對於袁世凱康有爲的行徑也提供一重要證明。

黃膺白（鄂）先生是民國史上有數的政治家，他不僅有爲有守，更能任勞任怨：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計個人毀譽，不爭當時的所謂是非，而毅然擔負起重任，爭取對敵國和戰周旋的餘裕時間。民國二十

二年塘沽協定前後，膺白先生忍辱負重的言行，在當時是頗不爲淺識的國人所了解，但對日抗戰勝利，證明膺白先生有遠見有擔當，祇可惜他本人不及親見王師北定中原就病歿了。六年前編者曾撰「今之寇準黃膺白」一文，以紀念這一代偉人。同時沈雲龍教授在撰寫若干專題之餘又奮力爲纂年譜，更顯出歷史學界的公論。今沈教授就年譜未刊部份特撰「黃郛攝閣的前後」（民國十三年）一文交本叢刊先行發表。編者希望讀者們特別注意，因爲這一論文主要憑籍是黃膺白夫人黃沈亦雲女士回憶錄未刊稿及黃夫人提供的若干有關的原始文件，這裏面透露了許多前所不詳的歷史真相。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黃沈亦雲女士爲着撰寫這一回憶錄，雖年逾花甲仍無間寒暑在美國大學選習歷史課程。惟其對於歷史學體認真切，因此，她一方面用謹嚴態度撰寫個人的回憶錄，一方面將她保存多年的原始文件提供給素未謀面的歷史學者。這一事例實在是海內外中國學人共同努力於中國現代史研究又一最佳證明；同時，黃夫人率先倡導將私人收藏公開，更是值得特別讚揚的。因如上述：當前搜求現代史料非常困難，如果國內外各方面的關係人士都能如黃夫人一樣：將其私人收藏公開或與歷史學者合作研究，我們史學界同仁真要馨香禱祝了。

如第一冊前言所陳：美國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Seattle U.S.A.）提議并供給費用的中國革命史研究計劃，一九五九年仍由編者負責在台灣大學主持繼續進行。本冊中「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陳炯明與俄共中共關係初探」及「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之研究」、「漢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四篇論文就是這一計劃下的成績

；現值這一兩年合作計劃告一段落，對於華盛頓大學的熱心贊助，應於此表示謝意。

拙撰「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陳炯明與俄共中共關係初探」二文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之傳佈」一書的一部份，全書發表尚需時日，因為若干關係人士（如李石曾等）今仍健在，沒有到「論定」的時候；再則許多資料仍有待中外關係方面的公開。即如這兩篇論文，雖經筆者努力搜求資料，仍有若干空隙；故祇是提出問題沒有作結論。但由於這些問題與孫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政策的歷史背景和環境關係密切，而過去論述却極少觸及此，因亟公開，希望與國人共同討論。

爲使專題論文與資料選錄能相配合，本冊特輯錄陳炯明叛國史，六月十六之迴顧等，并刊載中山先生墨跡及廖仲愷氏被陳炯明幽禁時手書詩詞，這些都是比較稀見而系統完整可資徵信的。

宋教仁與中國革命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原擬全書刊行時再行發表，茲以全書刊佈尙有待，而各方尋求現代史料目錄非常迫切，是編與張於英辛亥革命書徵、張次溪紀述辛亥革命史蹟書錄既互有詳略，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前後史事，當可提供線索，因先爲印行。

自本叢刊第一冊印行後，即迅速獲得海內外學人的良好反應和鼓勵，但編者絕不敢自滿。今當第二冊出版呈獻世人之前，更惟有誠懇地希望各方面的指導與督責。

吳相湘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五日於台北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二冊 目次

論文

- 一、一個幾乎被失落的歷史證件……………羅家倫……………一
- 二、黃郛攝閣的前後……………沈雲龍……………九
- 三、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吳相湘……………五一
- 四、陳炯明與俄共中共關係初探……………吳相湘……………九七
- 五、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之研究……………王德昭……………一一九
- 六、漢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全漢昇……………二七七

史料

- 一、宋教仁與中國革命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吳相湘……………三八七
- 二、六月十六之迴顧……………胡漢民……………四一一
- 三、陳炯明叛國史……………李睡仙……………四二三

圖片

- 一、宋教仁先生遺像……………目次後
- 二、于右任先生題字……………目次後

三、一九〇四年流亡東京之華興會會員攝影·····	目次後
四、一九二一年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江亢虎出席證)·····	目次後
五、民國十三年十月國民軍灤平起義攝影·····	目次後
六、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原稿·····	目次後
七、清室優待條件後方袁世凱手批·····	目次後
八、章炳麟爲溥儀出宮致黃郛函·····	目次後
九、黃郛參加臨時執政段祺瑞就職典禮攝影·····	目次後
十、張一鶚致蔡元培手函·····	目次後
十一、國民軍起義前段祺瑞致黃郛函·····	五〇後
十二、黃郛手擬國民軍起義通電原稿·····	五〇後
十三、馮玉祥赴俄前致黃郛手函·····	五〇後
十四、馮玉祥自俄回國後致黃郛手函·····	五〇後
十五、國父手書廣州蒙難記序·····	四一後
十六、廖仲愷雙清詞草·····	四一後

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要目預告

論文：

- 一、光緒二十九年之經濟特科……………房杜聯喆
- 二、辛亥革命時法國的輿論……………張馥蕊
- 三、胡漢民年譜……………蔣永敬
- 四、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李守孔
- 五、章炳麟吳敬恆交惡由來……………吳相湘

史料：

- 六、三韓扶桑訪尋現代史料記……………吳相湘
- 七、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朱和中
- 八、革命與反革命最顯著的一幕……………胡漢民
- 九、陳炯明叛國史（續）……………李睡仙

一個幾乎被失落的歷史證件

羅家倫

——關於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

最近因便從國外帶回我當年在駐印度大使館時期保留着、而後復經移存他處的個人文件一箱親自檢點，想不到在這裏面竟重新發現了張一鶚（仲仁）先生給先師蔡子民先生的一封信，關於袁世凱戊戌日記的，爲之喜出望外，因爲我以此信一定在大陸淪陷時失落了，曾經懊喪多時。

這封信的來源是如此：在民國十五年我看見左舜生先生所輯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裏有一篇袁世凱戊戌日記，當時即認爲不可輕信，至少應當詳加考訂以後再說，但第一步該做的便是追詢此件來源。因此我便寫信問中華書局的陸費伯鴻先生去詢問，覆函是此稿係從申報轉載，於是我又函詢申報陳冷血先生。他的回覆是從張一鶚先生處得來，張先生是當時東南耆宿，雖與袁世凱處誼頗深，且曾一度在袁的幕府裏担任過類似祕書長職務，但其人以謹飭而負清望。我想到蔡先生和他認識，於是請求蔡先生代詢；承允所請，並親函張先生詢問端的。蔡先生嗣將原函裁去不關此事的一段，而將有關全部，連信封一併寄給我。其原文如下：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一書，弟尙未之見。顧關於戊戌一節，係光緒末弟以袁將返里（即僞稱足疾之後），直以此事問之。袁曰：「吾有日記當與汝」。翌日以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紛，終未宣布。去

年况夔笙來蘇，弟以此與之，已編入申報叢話中。弟且曰：個中人物，只有南海，蓋爲證明是非。而南海始終未有隻字相答。其先時付印者在南通書林有一單行本，即費君（仲深）向弟處抄錄而流至南通者也。其緣起如是。先生何時遊蘇台，當迎候耳。弟明日往寧一行。專復，敬頌道祺！一囑首。一五、九、二。」

最近我在整理吳稚暉先生文稿時，發現他的剪報中，也有當時剪下袁世凱戊戌日記的一部份，刊載在民國十五年二月上旬申報「餐樓廡漫筆」一欄裏，漫筆下面署名「蕙風」，大概就是况夔笙的筆名，上面也說明是張先生「見貽」。

我於細讀這封信以後，再看一遍袁世凱戊戌日記的全文，我們更可以從以下各點裏，格外明瞭戊戌政變的情況和袁氏所以要發表這篇日記的動機。

第一、袁世凱要將這篇戊戌日記發表的時候，正是西太后已死，溥儀嗣位，而光緒的親弟載灃爲攝政王，繼起當國的時候，也正是袁世凱罷官回籍，生命幾乎不保的時候，於是急急忙忙發表這個文件，以求洗刷當時爲后黨爪牙的罪行。

第二、雖然張一鶚先生說是他曾經「直以此事商之」，袁「翌日以此相授」，但此決非一偶發事件，乃經袁事前一切準備就緒，甚至藉談天方式，故意引張發問。（一）此件並非按天寫成的日記，而係一篇紀事本末方式的長文，是有行文結構的。（二）此種長篇精細的文體，斷不是今天說後，明天就可交卷的，何況當時袁正在生命亟亟，心緒皇皇的時候。袁當時按天曾寫日記

與否，無從知道；按照當時一般當權大官明哲保身的慣例，似此秘密大計，斷不會見諸記錄，何況戊戌時期正是西太后黨得意之秋，而袁復爲后黨榮祿親信之人，豈敢在日記中作同情而有
意維持光緒之語。

第三、反之，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倒可以證明他至少是一個舉發譚嗣同與彼商談包圍頤和園密謀的重要人物。袁在日記中自稱不贊成此種密謀，但他爲譚之安全計，打算得却十分周到。他對譚說到這般話：「以我二人素不相識，你夤夜突來，我隨帶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洩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你爲近臣，我有兵權，最易招疑。你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可謂「爲人謀則忠矣」！但是戊戌八月初一日（西曆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六日）光緒召見袁世凱，把他從直隸臬司直升到侍郎候補，真是平地春雷般的發跡，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再召見，初五日第三次召見請訓回到天津，這些都是不容掩蔽，不須解釋的事。難道機警的袁世凱不知「善自爲謀」嗎？他如事前不與榮祿通聲氣，他能以煊赫的聲勢，回到天津嗎？果然他在請訓前一天西太后即已回宮，到天津後一日西太后即重行當政了。王小航在方家園雜詠記事裏說：「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真是一針見血的話。

第四、張先生信裏說：「弟且日個中人物只有南海，蓋爲證明是非，而南海亦始終未有隻字相答。」

「南海是指康有爲，在民國十四年張先生的此件交况夔笙時，大概以此言告况，希望他交給當

時還生存着的重要主角康有爲過目，並希望康能有所評述，證明是非，不意康始終未有隻字相答。張先生的希望是對的，但是他的要求未免太天真一點。須知勾結袁世凱以圖兵圍頤和園這件大錯，實係康有爲與譚合謀鑄成。康在「自編年譜」裏說：「時譚復生實服於吾，林墩谷亦曰：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藉譚、林通之。」康之友好又係戊戌新黨人物——王小航曾有下面一段文字：「圍禁慈禧之謀，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奪權之計，余已再三面駁，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顏面，然深信此諍友必不洩也。」後來於八月初三日（九月十七日）袁世凱從譚嗣同（復生）口中得到這全部密謀計畫以後，第二天西太后就還宮，第三天就政變，這敦康有爲何顏重溫這度失敗的慘痛故事呢？況且這日記中還牽涉到一件與康有爲極有關係的所謂衣帶詔問題，從袁的日記裏，譚以很不自然和頗難自圓其說的態度和手法，「出示硃諭，乃墨筆所書字甚工，亦彷彿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其大意微同其年七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三日）光緒令楊銳帶出的一詔。其實所謂「衣帶詔」本身就是一個謎，而康有爲以後在海外政治經濟的活動，如「保皇會」的組織，「富有票」的發行，都是以衣帶詔爲號召，而衣帶詔的本身又從不曾正式公布或以照片給人傳觀，據現在記載所傳，衣帶詔共有三個：第一個如據羅惇融「賓退隨筆」所載，則爲賜楊銳的密語。其中提名字的有「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爲了說明本來要「將舊法變盡」，「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但爲西

太后關係，暫時祇能緩進，全文並無衣帶詔的意義，時間當在七月十九日（九月四日）以後，其日期頗難確定。而且字數多到二百九十六字，是從容寫就的。第二個也見之於「賓退隨筆」，謂「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是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這個詔書凡九十六字，其中有「朕位幾不保……設法相救」字句，却含衣帶詔的性質。「賓退隨筆」註稱：「語蓋戊戌七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三日）所賜也」。而康有爲則作八月初一日（九月十六日）。羅惇齋說明此係楊銳之子於宣統元年詣都察院上書「敬繳德宗硃諭」的原本，即由攝政王交付當時「國史館敬護」，並曾經耆舊趙熙、王式通「先後錄以見示」。則亦流傳有緒。但據清史稿列傳三五「楊銳傳」所錄，則其文字又有出入，茲錄清史稿原文如下：「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保。爾與劉第、譚嗣同、林旭等（注意！此處無康有爲名字）詳悉籌議，如何而後能進英達，使新政能及時行之，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據清史稿這是楊銳的兒子慶昶於宣統元年向都察院呈請代奏的。但是根據署名蘇繼祖所著的戊戌朝變記，其中「楊參政公事略」一文所載密詔全文，也稱這是以楊慶昶所藏原本爲根據的，却與清史稿列傳中所載顯又有不同。

就在「亦不欲將法盡變」一句的下面，還有「雖由朕隨時幾諫，而慈意甚堅，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聖母已謂太過」數語。其餘字句間出入的地方亦所不免。所以出自同一根據而有三種版本的不同，是值得詳加考訂的。至於所謂第三個衣帶詔那祇是給康有爲個人的一道上諭，其原文爲「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這是光緒對他個人的維護，恐怕他在京畿遭遇危險，其間雖充滿了人情味，可是無論如何却加不上衣帶詔的名稱。在當年此件却又曾爲他隨身最大的法寶。（此詔與「寶退隨筆」所錄戊戌七月二十八日詔亦即康認爲係八月初一日詔，於康介紹門人陳介甫梁元理求救於李提摩太書中曾經提及。）像以上所列的幾件公案，又教康有爲如何舊事重提，向國內明眼人士交代呢？所以康有爲的「未有隻字相答」是不爲無因的。

張先生在信上說：「弟因不足解紛，終未宣布」。這是他看穿了袁世凱戊戌日記後所持的態度，也是他的評語。前一輩子人往往在簡單的一句話裏，含蓄了多少未盡之意。

因爲這封信及其有關文件，使我更感覺到考證史料的困難和評定史料價值的不易。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當然重視「第一手材料」（First-hand material）。像這種袁世凱親自寫交出來的戊戌日記，當然應

該分在第一手史料之內，可是其中引起的疑問却如此之多。可見得我們對於所謂第一手史料的處理和認定，還得經過許多手續。不但奸雄會欺人，就是英雄也會欺人；不但壞人會欺人，就是好人有時也會欺人；有人是蓄意的欺人，有人是無意的欺人，（也可能是由於記憶的錯誤）。所以無論是手寫的或是口說的史料，必須加以辨別：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他願意記錄或發表的用意，他本人的人格，性格，乃至他心裏的疙瘩（Complex），都要考慮和計算進去。再用同時有關人物的記錄，加以旁徵博引，直剖橫通，庶幾可明真象。當然一個人在無意中留下的記錄，比有意留下來的紀錄，要真確得多，可是這種機會並不易得。我不是來挫我們研究歷史的明友們的氣，不過願意提供一些應該注意的方面，以備參考。我們祇要能勤快的搜集史料，注意其來源，分析其內容，用縝密的科學方法加以考驗，敏銳的眼光和思想加以判斷，則大多數的史實，仍然可以逐漸把真象顯露出來，雖然若干的錯誤，仍然是免不了的，則留待他人或後人去解決，去批評，也是歷代以來，在史學界並不算稀奇的事。世上也有人以為不可能產生真正準確的歷史而灰心，我以為這大可不必，拿法庭審判來做比方罷：經過法庭審判的案件如此之多，有廉得其情，判斷準確而結案的，可是也有罪人漏網冤抑難申的，也有經若干年後而冤獄復經平反的，世界各國法庭都有如此現象，可是世界各國仍然維持和尊重司法審判制度，可見得這制度獲得的好成果還是遠超過於他不幸而產生的缺陷。從事這工作的人自然應當大公無私，兢兢業業去做，却不可因受到繁難困擾而短氣灰心。（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台北）

相湘謹按：張一麀心太平室集卷八「古紅梅閣筆記」（民國十九年冬自識）第四十頁有云：「戊戌一案，余入幕

後未嘗一言詢及項城，及其罷官時乃詢及之，項城曰：「此事余有記載，他日當寄汝一觀。余回南後寄來一冊，因其已往事故未宣佈，後見南通翰墨林已排印出版，今不贅」。覆按張致蔡手扎，即可發現兩者之間極多歧異：（一）袁以日記交張時間不同。（二）張不以之公佈的原因不同。（三）手扎自承無論南通印本或申報刊行都是自張處抄錄或付與，而筆記含混其詞。又民國二十四年秋張氏肩批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三頁）有云：「戊戌之變，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時，始終未敢詰問，直至宣統元年將歸河南之際，乃面問顛末，袁氏有手書一帙，後爲南通翰墨林出版。總之：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論世之難也」。與筆記語意又有不同。綜合這些歧異，張手扎的史料價值更顯得重要了。房兆楹先生在看到這一手扎前，曾作推測：袁的日記可能就是張的手筆或是在張建議與指導之下寫的。爲供同好研究，特併錄於此。